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6.001

# 阿微木依萝小说的情感共同体书写

袁田野, 金仕霞\*

**摘要:** 阿微木依萝对情感共同体的书写, 回应了“如何应对社会转型下的生存阵痛”以及“如何重建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阿微木依萝用现实主义的笔调, 书写了转型期边缘群体的困境, 并展现了人们在困境中的互助行为。这种互助超越了传统的血缘和地域的局限, 是构建现代情感共同体重要纽带。阿微木依萝对“自然”这一共有精神家园的书写, 实现了从“情感共同体”向“生命共同体”的升华。文章分析阿微木依萝小说中的“困境—共同体—家园”脉络, 呈现阿微木依萝的情感共同体书写, 揭示阿微木依萝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思想深度。

**关键词:** 阿微木依萝; 情感共同体; 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5)06-0001-09

收稿日期: 2025-11-11

基金项目: 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西昌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凉山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萝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 XCZL2424)。

作者简介: 袁田野(1994—), 女, 江西萍乡人, 西昌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E-mail: 1343057707@qq.com; \*通信作者: 金仕霞(1969—), 女(回族), 四川西昌人, 西昌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硕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 一、引言

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 人们经历着传统家园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式微以及新精神的家园形成。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基础的重构、社会价值观念的剧变、传统文化的失落, 都与个体生命发生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个体生命应如何面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困境, 传统家园式微后新的精神家园应如何构建等都是阿微木依萝的小说所展现的独特价值, 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具有敏锐的时代洞察力, 体现了对现代性困境的思考,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 对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的探索。

目前, 关于阿微木依萝小说的研究还不多,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阿微木依萝小说的底层书写, 二是阿微木依萝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现有研究认为, 独特的叙事空间映射了阿微木依萝的底层关怀和文化选择, “人物群体从乡土空间到都市的物理空间的转变, 象征的是他们社会属

性和社会空间的变更”<sup>[2]</sup>，“如何为这片本就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土地发声，已经化成了阿微木依萝的自我写作要求和责任”<sup>[3]</sup>，对人物苦难的书写则隐含着人性光辉，“阿微木依萝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序列，如同一面生活的镜子，既映照自身，又反射他人”<sup>[4]</sup>。此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阿微木依萝小说中的核心主题。“阿微木依萝作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素，不是概念化的灌输，而是源于对脚下土地的深情、对共同历史的铭记、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洞察”<sup>[5]</sup>。

悲悯与共情是阿微木依萝“底层书写”的创作起点，情感选择和精神归属是阿微木依萝书写共同体的价值纽带。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探析阿微木依萝小说“情感共同体”的书写，试图呈现一条从个体到群体、从人类到自然的叙事逻辑，以此揭示阿微木依萝小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现实深度。

## 二、唤醒同感：转型期边缘群体的困境书写

对个体生命困境的思索，一直是阿微木依萝小说创作绕不开的主题。透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到，城乡边缘群体的困境尤其得到阿微木依萝的关注。无论是小说《太阳降落的地方》中失明的工薪阶层女性，还是《毛竹林》《像一场亮脚雨》中家庭经济崩塌的农民，抑或《失约》《有雨漏下来》里的空巢老人，都呈现了阿微木依萝对城乡边缘群体的看见、共情与关怀。在这种对边缘群体困境的书写中，隐含的是作家对转型期社会阵痛的深刻观察与思考。形形色色的个体生命中，所呈现的共同困境究竟是怎样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纽带逐渐松动，其背后的传统价值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以此为思考的起点，阿微木依萝在作品中注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人们生存状况的共情，正是作家的社会担当和命运共通意识的体现。

这种困境书写是从对物质困境的叙写开始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压力与传统生存方式的冲突，是人们遭受物质困境的根源之一。小说《像一场亮脚雨》揭示了传统农耕经济“看天吃饭，有余粮”的生存逻辑在应对生活债务时的举步维艰。主人公雁地拉威是一个因工伤致残，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民。身体残疾让雁地拉威时常感受到尊严的丧失，并觉得自己是个“废人”。长久的压抑情绪在同村的吉鲁野萨散布谣言后爆发，雁地拉威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由于吉鲁野萨无休止地索要住院费用和医疗赔偿，雁地拉威不得不变卖家庭赖以生存的粮食，直到谷仓新收的粮食变卖得差不多了，这个丧失了主要劳动力的家庭也最终经济崩塌，走向破产的边缘。小说《失约》则展现了农村老年群体在乡村空巢化进程中面临的物质困境。女主人公马玉兰虽然已经年老体衰，却只能靠着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维持生计。子女进城后，马玉兰只能独守着老宅，不仅无法再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方式生存，还要面对儿子回乡时的索取，甚至被儿子怀疑藏有首饰盒，不愿意拿出来还房贷。微薄的积蓄，日益衰弱的身体使她连基本的生活保障也难以维持。由于子女常年在外，无人修缮住所，老宅山墙逐渐垮塌，这也意味着主人公最后的物质依托的崩塌。尽管农村经济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最为剧烈，但阿微木依萝对生存困境的书写并不局限于农村土地。在小说《太阳降落的地方》中，主人公段青萍在失明后无法继续原来的编辑工作，只能被迫辞职，主编塞给她两千元后便不再过问，公墓的工作人员则以“协议”为名，冷漠地催她缴纳亡母的护墓费，将她推向难以回避的生存危机。

阿微木依萝在小说中频繁地刻画一些具有生理疾患，丧失劳动力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所面临的物质困境往往与生理疾患相关，他们不仅承受着肉体的苦痛，还陷入了个体价值感丧失的困境，生理疾患

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人物边缘化的境遇。在阿微木依萝的笔下,身体残缺不仅带来了生理上的痛苦,同时也意味着自身失去了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并以此养家糊口的能力,从而逐渐滑向边缘角色,丧失了对自我的认同,最终导致个体尊严的崩塌。这也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物质困境因身体残缺而起,又反过来阻碍了身体的康复;尊严的丧失因物质困境而加剧,又让人失去了摆脱困境的心气与勇气。《像一场亮脚雨》中的雁地拉威在沦为“废人”后,强忍着腰和腿上的病痛,扔掉拐杖下地干活,尽管这种强撑使他比以前更加虚弱,萎缩的腿更加细弱,但他仍以这种近乎悲壮的方式,试图挽回失去的尊严。然而,身体资本的丧失,在依靠体力劳动的传统乡村生产体系中,让主人公彻底陷入一种“无能”的失败感中。在《太阳降落的地方》中,伴随身体残缺的是个体与社会生活的割裂,段青萍失明后被迫辞职,从一位有才华的编辑变成一个需要被“施舍”的对象,这种身份落差本身就是对自尊的酷刑。截肢的吴丽琪最终自溺于“干海子”,在丧失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后,选择舍弃“无用之身”。

相较于物质层面的困境,情感层面的困境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带来的是更深一层的心灵侵蚀。阿微木依萝在《失约》《深夜丛林》等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亲情、伦理、信任等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改变,小说中的人物难以适应传统情感纽带的断裂,而遭受着孤独和空虚。传统亲情模式的改变和代际关系的断层,是人物遭受情感困境的根源之一。小说《失约》描绘了马玉兰与子女的情感隔绝。乡村老宅是老人生命的见证,承载着一生的记忆与情感,对老人而言是家族的根脉和灵魂的栖息地。但对于在城里定居的子女而言,新的生活经历逐渐覆盖了对老宅的情感与记忆,老宅更多地代表着“过去”。马玉兰定居城市的儿子虽然经常回老家,却从未对她表示关心,反而向她索要钱来还房贷,他带着妻子回乡时,行至家门口,只为摘走门口的果子,而不愿迈入老宅一步。儿子回乡频频露面,在村人眼中留下了“孝顺”的印象,也使马玉兰的孤独无人理解。

乡土社会中传统亲情纽带的松散,还表现为家庭模式由聚居的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在小说《有雨漏下来》中,物理空间的疏远暗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隔阂。女主人公独自抚养六个孩子,为了避开荒年的野兽,她带着年幼的孩子挤住在树上,含辛茹苦将孩子们抚养成人。到了晚年卧床不起时,她却感受到了儿子们的冷漠和嫌恶,才意识到早年作为寡母所维持的强势外表在子女眼里是严厉和控制欲的表现。在孩子逐渐长大后,家庭空间从一家人聚居的树上转移到宽敞地面,母子间的情感却逐渐淡漠。她偏爱的小儿子最早离家,三儿子也与她断绝关系,这些断裂的亲情链,都构成了老人情感世界的创伤。从“树上聚居”到“地面散居”,隐喻了家庭成员之间心理空间的疏离,也是家庭模式从传统大家庭的生存共同体,向个体小家庭转变的体现。子女们对大家庭的忠诚逐渐让位于对小家庭妻子、儿女的责任,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动摇了母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最终儿子们通过“离家出走”和“断绝关系”的决绝的方式,宣告了自我的独立。

在小说《太阳降落的地方》中,亲情以一种更为荒诞的形式呈现在小说中。女主人公段青萍在失明后看到亡母以“鬼魂”的形态归来,母亲归来后却并未对失明的女儿表达关爱,只是用没有任何感情温度的话语向女儿索要护墓费,“当然是我的亲生女儿呀,不然怎么来找我给我续费呢”<sup>[15]</sup>。从母女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母亲将血缘关系直接等同于经济责任,暗示亲情已死,血缘关系退化成为一种以传统孝道为掩护的剥削。

与此同时,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也使原本稳固的人际联结变得更为脆弱。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由血

缘和地缘凝结而成的共同体，邻里间往往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在阿微木依萝的小说中，亲友的背叛、承诺的幻灭、失信与失约，都是频繁出现的情节，这些都加剧了人物情感的失落。在《失约》中，女主人公的丈夫承诺要在死后与她在“草棚”相会，丈夫死后，她才发现根本没有草棚，她一生所信仰的情感依托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虚幻。在小说《像一场亮脚雨》中，雁地拉威为了给乡邻吉鲁野萨帮忙而受伤致残，吉鲁野萨不仅没有表示感恩，反向失去劳动能力的雁地拉威持续索取，雁地拉威最终以生命的自我结束来摆脱身心的双重困境。小说中吉鲁野萨对乡邻的无限索取，表现了这种信任纽带的断裂，邻里之情也被利益计算所取代。在小说《深夜丛林》中，武小青经历了亲情与爱情的双重背叛。她被哥哥们捆绑送至夫家，嫁给陌生的新郎。而她曾寄予希望的恋人黄安坤，却因害怕舆论而选择退缩，在武小青逃离包办婚姻的路上，黄安坤的出现不是为了救她，而是为了撇清关系。当传统的血缘、地缘、婚姻所缔结的情感与信任纽带，在利益计算的价值观念下失效，人物便被推向了一种深度孤独的情感困境。

传统的生活紧紧依附于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传统共同体，文化之根也深植于故土家园。现代性的冲击则使个体陷入了一种割裂状态，离乡者既难以彻底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又与故乡产生了隔阂，成为双重的异乡人；留守故土的人则意识到传统文化正在走向衰落，个体只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小说《破茧》中的主人公格日阿火徘徊于本族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他试图“破茧”，却陷入了更深的身份认同危机。

此外，这种自我认知的困境，还表现为人的主体意识在消费社会中的失落，以至于对生活意义的感知逐渐剥离与丧失，“消费社会导致本真生存的失落，诸如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神圣意义的隐匿，符号对人的操控，主体的消失，人被塑造成完美消费者”<sup>[6]</sup>。阿微木依萝在小说《太阳降落的地方》写到人物的失明，隐喻了现代个体沉溺于种种消费符号所编织的生活幻象之中，从而疏于对真实生命意义的感知，“失明”正是感知钝化的具象化表现。女主人公段青萍在失明前本是一名编辑，多年来忍受着枯燥压抑的工作，才勉强攒够城市房产的首付，只能靠着昂贵的咖啡来强撑精力。作者意图揭示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对普通个体精神与生活的形塑，小说中的“咖啡”和“城市房产”作为中产身份的象征，营造了一种“美好生活”的意义指向，这不仅为个体忍受无意义的工作提供了合理性，同时也是城市工薪阶层获取社会认同的自我身份标识，人物也以此掩盖内在的疲惫、空虚和疏离感。因此，“失明”并非人物痛苦的主要根源，而是主人公精神困境的象征，暗喻了现代个体对于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内在感知能力在消费主义和生活重压之下逐渐榨干、耗尽，进而陷入感知钝化、灵性枯竭的状态。

当物质和情感支柱都已崩塌，人物被迫面对的已不再是具体的、个别的困境，而是一切痛苦背后的根本性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应对生活的荒诞？阿微木依萝也更进一步地将对于人物生存困境的思考，延伸到了比物质与情感更深的层面，即对于生命存在的终极拷问，这也使得小说的困境书写呈现出了超越特定地域、民族与时代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 三、从断裂到共融：情感共同体的互助纽带

阿微木依萝自觉将对生存困境的思考寄寓于小说中，认为不同个体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共通的，透过小说可以看到，人物并非被动承受苦难的孤立个体，在看似断裂的人际关系中，潜藏着一种互助共生的情感纽带。小说探索了构建一种新型情感共同体的可能性，当传统共同体的价值伦理观念在现代性

的冲击下分崩离析,需要构建的是更具自发性和选择性的情感共同体。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一条跨越地缘、血缘和民族界限的坚固纽带,也是构建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基础要素,其中的支撑力量是人们对“共荣共生”的认同。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乡邻情谊逐渐淡化,“传统的血缘人际关系网及地缘人际关系网的弱化,导致核心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日益脱离,形成一个个家庭‘孤岛’”<sup>[7]</sup>。小说《像一场亮脚雨》就表现了乡邻纽带的断裂。《毛竹林》是《像一场亮脚雨》故事的后续,通过对人物之间互助行为的书写,使断裂的乡邻纽带重新联结。在小说《毛竹林》中,互助行为虽然是出于人物的赎罪心理,但在小说的最后,这种互助行为修复了因社会现代化冲击而断裂的乡邻关系,弥合了过往的伤痕,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种互助共生的关系。《毛竹林》是对小说《像一场亮脚雨》的情节的延续,吉鲁野萨对雁地拉威犯下错行,最初是源于对金钱利益的欲望,也反映了传统乡邻情感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失落。但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吉鲁野萨和妻子将全部的粮食赠予雁地拉威家的孤儿寡母,粮食是生存的根本,将劳动所得的粮食赠予受助者,则是一种最直接和实在的援助。而吉鲁野萨妻子主动承担的赎罪行为,则重建了断裂的纽带,这条纽带不单单是由痛苦和补偿构成的,其中还隐含了女性之间的善待和互助,“昨天我像马一样干活,装玉米的口袋一边一袋挂在我的腰上,肩膀上还扛了一袋。雁地拉威是不舍得他的女人受罪的。他至死都要保护她,还有他的小儿子”<sup>[11]73</sup>。妻子的这番话表达了补偿行为背后的复杂心理,这种复杂心理包含了对逝者的愧疚,也更多的是对生者境遇的同情和悲悯,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善意的行为,也重构了一种共生共荣的乡邻关系。

小说《深夜丛林》则展现了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在面临相似的困境时,自发选择结成精神同盟,这一精神同盟不依赖于血缘或地缘,而是建立在共同命运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在小说《深夜丛林》中,三位女性人物武小青、依薇、武敏的命运有深刻的相同性,她们都在逃离父权制婚姻与性别压迫。武小青被哥哥们强行安排婚事,绑送到新郎家中,为了反抗,她只有从“瘦狗才能通过”的窗口逃走;依薇则逃婚多年,隐居在树林深处的山洞中,由于脱离社会太久,被人们视为疯子;武敏被同村女性拐卖到北方,遭到了囚禁和暴力对待,她十年间不断逃跑,最终逃回了家乡。三位女性在深夜的丛林中相遇,并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女性共有的困境。她们拒绝接受“女人就该认命”和“婚姻是归宿”的传统观念以及身体被当作交易、生育、暴力对象的物化角色,即使逃离“精神囚禁”的代价是被群体所放逐也在所不惜。

《深夜丛林》中女性之间的互助,不仅是个体层面的扶持,更是女性在父权制和传统共同体压迫下,建立一种相互理解与共情,互相传递智慧的联盟。这种互助行为首先表现为女性之间的诉说和倾听。在父权话语的宰制下,女性的声音往往受到忽视和压抑。因而女性之间的相互倾诉和共情,能够打破个体承受苦难的孤独感,使彼此意识到她们共同的困境源于父权话语的无形枷锁,从而将个人创伤转化为共同经验,凝聚成属于女性的命运共同体。在《深夜丛林》中,武敏向武小青倾诉了自己在被拐的十年间身体残疾,骨肉分离的极端痛苦;武小青也向武敏倾诉了被兄长捆绑嫁人的屈辱;依薇作为反抗的先行者,在回溯自己的隐居经历后,提出女性所遭遇的悲剧并非源于自身的过错,而是身处父权制度下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这种诉说、倾听和共情的过程中,三位女性人物基于共同的苦难和共情,凝聚成了一种对抗性的话语,打破了女性“失声的状态”。

其次,被压迫的女性通过相互传授逃亡经验,开辟了一条与父权制相抗衡的生存路径。依薇告诉武小青“有些房子不一定非要修在地面上”,并传授了利用山洞等边缘空间来生存的经验,引导女性群体创造了一个父权规训之外的流动的庇护所,以此抗衡以父权秩序下以传统婚姻和家庭空间为代表的“地面上的房子”。将火把分一半给武小青这一动作,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黑暗、危险的丛林中,火把是光明、温暖、方向和安全的源泉,人物分火把的动作,意味着女性不再是被黑暗吞噬的孤立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她们用共同的光明,在父权制下的“深夜丛林”中,开辟出一个抵御压迫的对抗性空间。

在《太阳降落的地方》中,阿微木依萝构建了一种超越世俗功利、回归自然本能的互助共生关系,人物通过生命力量的互补,对抗现代性带来的孤独感,并以之构建一个共生的精神家园。首先,小说表现了一种生命力量互补的生存同盟,吴丽琪和段青萍两位身体残缺的女性人物在绝境中达成了一种生命契约。她们将各自残存的行动力与视力进行交换,通过一根“狗绳”的连接建立了一种互助和共生的关系,“就当我是你的狗腿子,而你是我的导盲犬”<sup>[119]</sup>。她们在对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部分,共同构建了一个能够抵御外部世界风雨的微型共同体,以此对抗被社会抛弃的孤独与绝望,实现对自身悲剧命运的短暂超越。其次,《太阳降落的地方》还展现了一种深植于自然的共生关系。段青萍与牧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正揭示了这种共生关系的本质。对于牧人而言,段青萍的到来打破了原本的孤独寂静,生活中多了一个能与之精神交流的灵魂伴侣,使他能够抵抗漫长岁月中的精神虚无感。对于段青萍而言,牧羊人是将她从生活囚笼中解救出来的人。在此之前,段青萍时刻陷在现代都市生活的焦虑与紧迫感中。在她与牧人来到草原生活后,生活顺应的是自然节律,日出放牧,日落歇息,依据季节迁徙。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五年”“六年”,正是采用了“年”这一最原始、最贴近土地的自然时间单位,改名也标志着她彻底融入了生命的自然循环。牧人和段青萍的情感不依赖于海誓山盟,而是与放牧、迁徙、露营等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不同于现代城市生活中追求“等价交换”的契约关系,牧人和段青萍像自然万物一样,无条件地、沉默地相互依存,这种共生关系是源于一种回归自然本能的吸引与依靠。

#### 四、从情感到生命:精神家园与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精神家园承载着一个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和群体成员共有的精神归属,“社会共同精神家园为社会和具体的人提供了基于一定现实的理想或理想依据”<sup>[8]</sup>。阿微木依萝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个体之间命运共通的生存图景,展现了个体之间互助共生的情感纽带,还构筑了一个超越民族与地域,蕴含着“生命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家园。生命共同体意识在关注人类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包含了动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新时代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新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我国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伦理文化传统转化为适应现代中国语境下的伦理内涵和话语表达,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深切体认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复杂有机联系”<sup>[9]</sup>。

阿微木依萝对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构筑,依托的正是自然空间。在她的作品中,自然空间具有三重特质:其一,自然空间被塑造成一个具有疗愈力量的精神场域,它以其超越人类社会的独特价值体系,为创伤性个体提供了一个精神庇护所和救赎空间,展现了生命共同体对个体价值的包容性和滋养功能。

其二,自然空间展现了一种非功利主义的、强调共生性的自然法则,引导个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框架,构建一个包容万物的生命伦理体系。其三,自然空间作为文化认同的象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阿微木依萝的作品中,自然家园所呈现的意象,不仅是特定民族的精神原乡,更是多民族共同珍视的精神家园。阿微木依萝的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构筑了深植于文化记忆的自然家园,将自然空间塑造成承载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从而深化了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在阿微木依萝的笔下,自然充满了灵性,是能给予人启示与慰藉的生命主体,更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各类生命共有的精神家园。小说《毛竹林》中的自然空间被描绘为一方纯净、神性的自然净土,是人物在冲出现实围困后,重新安放生命的精神家园。吉鲁野萨和妻子为了躲避村里的舆论压力,搬到“毛竹林”这一险峻之地生活。小说如是描绘“毛竹林”的地理景观:“毛竹林四面环绕着高耸的峭壁,峭壁之上是连绵的高山,一座接一座,再远处则是云天相接,山外的远方隐约可见,那远方模糊不清,仿佛云雾缭绕或青蓝色的沧海。”<sup>[1147]</sup>“模糊不清的远方”不仅是物理距离上的疏远,也隐含了另一重意义,即人物在以一种精神朝圣的视角凝望远方,“模糊”体现了“远方”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遥远的视角则指向一个指引人向前的永恒坐标,“云雾缭绕”表现了这个地方超脱凡尘的仙境色彩,“青蓝色的沧海”则是浩瀚与纯净、广阔与自由的象征,如世界本源般清澈宁静。四周环绕的“高耸峭壁”则是隔绝外界的屏障,可为人物提供一个不受外界打扰的、可以重建生活的庇护所。安顿下来后,吉鲁野萨在石缝间播种、在房顶听雨、在林间寻路。在日常的劳作中,他感受到自己与自然的连接,从而生起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从,以此完成了对内心自我的审视与道德净化,“他希望天上赶紧下雨,即便此刻下雨会淋湿他的玉米,但可以淋湿他。这几年心里一沉闷,雨水总能使他从混沌中醒来”<sup>[1151]</sup>,雨水能够涤荡内心的沉闷,令生命重获鲜活,自然在此处被赋予了净化和救赎功能。

在小说《太阳降落的地方》中,“干海子”这一自然意象承载了复杂的生态伦理意义。在小说中,“干海子”虽然接近干涸,却在传说中被身患疾病的人们投射了希望。走投无路的吴丽琪虽然知道“干海子”的神性只是传说,却并未选择离开,反而把这块土地作为生命的终点,将肉体这一生命最终的物质形态归还给自然。吴丽琪因截肢被视为“无用之人”,面对同样被视为无用的“干海子”,她与这片自然之地产生了共鸣。将肉体融入“干海子”的生态循环,一方面是“尘归尘,土归土”的传统生态理念的体现,体现了自我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的融合;另一方面,也是个体在回归了自然这一本真空间后,重新获得了生命价值,打破了社会空间基于功利主义对个体所施加的“无用”评判。

自然家园还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与集体认同。“家园作为一个地方,是开放的、可渗透的,也是社会关系和各种情感交织而成的产物”<sup>[10]27</sup>。在阿微木依萝的小说创作中,高山、丛林、草原等自然景观,构筑了一个民族关于“边疆”“山林”与“故土”的经典意象体系。这些意象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界限,成为整个民族心灵共通的精神寄托,既是想象中的“远方”,也是精神层面的故乡。自然家园中所交织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依托,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生命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而普遍的文化认同。

小说《松山脚下》构筑了一个包含了溶洞、茅屋、松林等意象的“桃花源”,隐含了作家对精神原乡的想象与追寻。小说中的“溶洞”是连接现实世界与精神桃源的神秘通道,这条黑暗的通道最终引领人物抵达了一个月光朗照的松树林,一个超验的净土:

松林中有溪水声传来,贴在地面流动的那种响音,轻柔,也有被石头阻挡后撞击的脆响。我一路

循声过去,声音却消失了,什么动静也没有。翻过山头,眼前又一座高山,月光牵着山尖一路向上,越高越薄,到了最高处,山体像纸一样,最后跟云雾混合,完全分不清了。让我觉得惊讶又高兴的是,高山脚下有一所茅屋;我与它隔着一条深深的河沟,茅屋修在对面山脚的位置,从我这边看过去仿佛高耸入云。

在这段对自然空间的描写中,溪声如同心灵的指引之音,呈现为一种细微而灵动的生命律动。动中的极静,使得这片理想之境显得充满生机而不喧闹。溪声能被听见,却难以被找到,可以感知而不可触碰,表明了精神家园是一个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所在,只能借助内心的感知去无限接近。“像纸一样的山尖”则消解了高山沉重、坚固的实体感,使得高山如纸片般轻盈无实质。山体最终与云雾混合,完全分不清,是对实相的进一步化空。山体由月光牵着,越高越薄,直至化入云雾,也暗喻了人在抵达精神家园后,心灵受到如月光的内心光明牵引,最终蜕去物质实相,露出如纸般空灵的本真之相,沉重的执念化为轻安的自在。“河沟”象征着抵达精神家园的最后屏障,这也隐喻了追寻者内心深处一丝未尽的执念。茅屋本应是低矮的,在此处却被描述为“高耸入云”,因为茅屋也是追寻者心境的投射,因而在追寻者对终极归宿的渴望与景仰中显得高耸入云。阿微木依萝通过“桃花源”的文化原型构筑了民族共通的“精神地理”。这片精神家园并非一个具体存在、等待被发现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由主体心灵所投射的,需要借助内心感知去印证的精神层面的家园。

## 五、结语

阿微木依萝通过展现人物在物质、情感、存在三个层面的困境,构建了一个命运共通的生存图景。物质生活的保障,对情感联结的渴望,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每个生命个体共同的需求。从表层叙事上看,阿微木依萝书写的是个体在不同境遇中受到的苦难。但从深层叙事上看,这些形形色色的困境书写,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状态中共同的脆弱性、孤独感和精神诉求,每个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反抗是无声的呐喊,都构成了一种跨越地域、民族与社会身份的叩问:当外部世界无可依靠,当传统价值分崩离析,当意义本身已然失落,人将何以自处?生命的尊严何在?但这无声的叩问,最终都落回一个朴素的共识:不同个体在共享着同一种生命的脆弱,也在彼此的命运中照见自己,并在共通的命运维度实现了跨越具体境遇的联结。

小说所叙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融合为一个跨越了民族、血缘、地缘的情感共同体,消弭了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深层次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在此基础上,阿微木依萝将个体的精神需求与民族共通的文化认同相结合,构筑了一个具有生命共同体意识,包容万物,和谐共生的精神家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命力量由小至大,文化与情感认同由微至盛,以此共同长久和光大。阿微木依萝的小说创作不仅展现了个体与自然、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更为情感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 阿微木依萝.太阳降落的地方[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 [2] 阿苦有色.理想型自然与豁达坚韧的生命力——从空间理论视角解读《檐上的月亮》[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2

(4):18-23.

- [3] 汪涵颖.论底层书写的空间叙事艺术——以阿微木依萝的《出山》为例[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126-130.
- [4] 祁丽岩.在山与城的边缘游走和寻找——阿微木依萝非虚构写作中的女性形象构建[J].当代文坛,2022(2):212-217.
- [5] 金仕霞.阿微木依萝文学创作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表达[J].芒种,2025(12):43-45.
- [6] 张芳德.消费社会本真生存的失落与拯救——鲍德里亚消费文化理论研究之三[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5-59.
- [7] 张玲莉,刘永成,韩剑英.社会变革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J].科学中国人,2005(10):54-57.
- [8] 兰卓.社会转型期与人的精神家园的重构[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
- [9] 张彭松.生命共同体视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考量[J].社会科学论坛,2024(4):5-13.
- [10] 艾莉森·布伦特,萝宾·道林.家园[M].刘苏,王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The Emotional Community Writing in Awei Muyiluo's Novels

YUAN Tianye, JIN Shixia

**Abstract:** Through her writing about emotional communities, Awei Muyiluo responds to the contemporary question of "how to cope with the pains of survival und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how to rebuild spiritual homeland". Awei Muyiluo employs a realistic tone to depict the plight of marginalized group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showcases people's mutual assistance in adversity. This mutual assistance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emotional bonds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bond in building emotional communities. Ultimately, Awei Muyiluo achieves a sublimation in her writing from "emotional community" to "life community" through her depiction of "nature", which shared spiritual homeland. By analyzing the thread of "dilemma--community--homeland" in Awei Muyiluo's novels, this paper presents her writing about emo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veals the unique value and ideological depth of her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Awei Muyiluo; emotional community; spiritual home

责任编辑:周兴涛